

鸦片战争时期的汉语“三剑客”

——综论郭士立、罗伯聃、马儒翰的在华汉语活动

王 幼 敏

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取代法国称霸世界的世纪，在摆平西方后就急于向东方扩张，其梦想中的目标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其时英国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向北美、非洲、印度、东南亚的殖民扩张也不能消化其新型产能。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形成的巨大市场，以及广袤无边的领土和富饶的资源，自然引起这个世界霸主的垂涎。其时也正是西方基督教新教势力急剧膨胀的时期，英国是新教的主要国家。由此不少英国人做起了“中国梦”，梦想到中国来成就一番事业。传教士和商人是来华急先锋，他们以英国的强大国力做后盾，为了实现各自心中的梦想，纷纷奔赴中国，积极地学起了汉语，逐步形成一股潮流。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之“热烈”，莫过于鸦片战争时期，笔者从这段历史时期中发现有三个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成绩骄人，声名卓著，足堪启示我们。这三个人的汉语水平较之今天央视“汉语桥”比赛的选手实有过之，他们的汉语实际应用能力远超“汉语桥”的夺冠者。这三个人“学汉语”的典型意义至今仍未过时，他们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郭士立、罗伯聃、马儒翰。

郭士立、罗伯聃、马儒翰三人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华西人中的汉语佼佼者，笔者借用法国大仲马小说《三剑客》之名，谓之“汉语三剑客”。其中罗氏、马氏均为英国人，郭氏虽是普鲁士人，但毕生为英帝国谋利益，并先后与三位英国女人结婚，说他是半个英国人也不为过。三人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却风云际会于中英鸦片战争这个历史大舞台，凭借着同一种武器——娴熟的汉语，为了英帝国的伟业同中华帝国作战，演出了一场至死落幕的人生活剧，最终都葬身于中国，殊途同归。

他们是同时期人，而且都服务于英国，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三人是那个年代学习、运用汉语的“成功人士”，可作为19世纪中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杰出代表。本文重点不在于赘述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充当翻译所建立的“功业”，而拟综合论述他们三人的在华汉语活动，举凡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以汉语为工具所进行的传教、经商、外交、著述、译作、办报、办学等活动，本文均一言以蔽之曰“汉语活动”，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阐述：

1. 三人学习汉语的动机和过程
2. 三人汉语的特色和水平
3. 三人的中文著述、译作和教科书
4. 创办“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和《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5. 对三人的评价

对上述五方面内容，本文不分别阐述，而是以人为目，将这些内容糅合于各人事迹中加以阐明。三人中年龄最长者数郭士立，次为罗伯聃，再次为马儒翰，以下序齿述之。

一、郭士立

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普鲁士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其中文名又译作郭实腊、郭实猎、郭施拉、居茨拉夫等。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皮里茨镇，仅上了5年学就辍学当了工匠学徒。15岁时，有一商人向他讲述《巴色杂志》上的海外传教消息，于是萌发了去海外传教的念头。1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资助，进入柏林一所神学院学习，期间学习了英语、荷兰语等。1823年毕业，应荷兰传道会的招募，前往鹿特丹神学院深造，准备到东方的荷属殖民地传教。在此期间，郭士立同情希腊独立战争，一度想去希腊传教而到巴黎学习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1825年，荷兰传道会派他去英国“伦敦传教会”学习传教事务，从而结识了正回国休假的马礼逊。马氏的在华传教事迹与突出的中文成就让郭士立印象深刻，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有了初步认识。

1826年23岁时，郭士立从鹿特丹神学院毕业，随即被封立为牧师，派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传教。1827年抵达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受到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接待。其时苏门答腊岛正发生战事，只好先协助麦都思在爪哇传教，对象是当地的土著和华人移民。他注意到麦氏能用他们的语言直接讲道，于是决定向麦都思学习马来语和汉语。1828年他有机会去暹罗两个月，在曼谷的华人区布道，继续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他感到“闭关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传教地中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¹⁾。麦都思的影响和暹罗之行，使郭士立向华人传教的兴趣和愿望日益增长，并最终确定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的目标。

郭士立要求荷兰传道会改派他在暹罗华人中传教，但遭到拒绝。郭氏于

是在1829年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独立传教士，到新加坡活动，继而前往马六甲，暂时代管那里的伦敦会传教基地。

1830年2月，郭士立带夫人再次前往暹罗，在曼谷住了一年。他很快学会了暹罗语，继续在当地华人中传教，学习福建话、广东话和中国官话，并且归宗于来自福建的郭氏家族，取名“郭士立”。他宣称自己“已归化中华帝国，成为其国民了”²⁾。

从以上所述可知，郭士立的传教目的地和为之学习的语言，几经变化，最后才确定为学习汉语，到中国去传教。

1831年至1833年，郭士立进行了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以证明中国大门并非牢不可破，事后又出版了《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被西方人认为具有开拓性意义。诚如美国传教士特雷西在1833年所言：“我们的兄弟郭士立已经把商人和传教士的视线同时引向中国海岸，为他们的事业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³⁾此外，郭士立还两次策划前往日本散发中文传道书，试探传教的可能性，遭到日本幕府驱逐。

郭士立在沿海航行中，发现以行医施药的方法传道，更容易吸引接近中国人，他是第一个提出“医务传道”设想的新教传教士。

1832年英文报纸《中国丛报》在广州创刊，郭士立成为5个主要撰稿人之一，总共发表了51篇文章，介绍、评论中国情况，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他是《中国丛报》上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最多的撰稿人，《红楼梦》、《聊斋志异》和《三国演义》这三部中国经典小说，都是他最先介绍给西方读者的。

1833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旨在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用事实证明西方人不是未开化的“蛮夷”，以打击“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排外观念。这份期刊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客观上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扇窗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1834年，经郭士立倡议，“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广州成立，旨在出版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郭士立任中文秘书，负责具体事务。同年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翻译。

1835年在澳门协助其第二位英国夫人开办了中国境内第一所教会小学，免费收留中国贫苦儿童接受教育，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即在其中。

1836年至1840年，他与马儒翰、麦都思、裨治文共同对马礼逊的《圣经》中文译本进行了重译修订，他出力较多，该译本被称作“郭实腊译本”。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郭士立充当英军翻译，全程参与战争以及《南

京条约》的起草谈判，并因其汉语能力和对中国的了解被英军委任为定海、宁波、镇江三地的“民政官”。1843年接替病死的马儒翰，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直至1851年病故。

1844年，郭士立自己出资成立“福汉会”，培训华人向华人传教，首开传教“本土化”的先例。

郭士立是个语言天才，多产学者。他不但懂中国官话，还通晓广东话、福建话等中国方言。据说他会12种语言，可用其中6种写作，身后遗著不下85种，包括61种中文著作，其中约50种是传道书。下面介绍几种郭氏较有影响的中文著作：

《大英国统志》，1834年出版，是本故事书。通过一位游历英国多年的中国人之口，讲述英国各种社会情况，宣扬英国在世界上的先进性。

《是非略论》，1835年在新加坡出版，是郭士立采用话本体创作的一部小说。借英国归来的陈某之口，与好友李某辩论英国是否“番国”、“夷人”，宣扬“大英国”的种种好处，批评中国人骄傲自大，视外人为“夷狄”的观念。

《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前者为欧洲国别史，后者为世界地理，均是针对中国自视为世界中心，无视世界各国而编写的。

《贸易通志》，出版于1840年，是第一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贸易、货币、金融制度的书籍。

此外，郭士立的英文长篇小说《论中国语言》、专著《中文语法指南》都对汉语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郭士立是第一个提出应将“夷”字对译成 barbarian（野蛮人）的西方人，他运用所掌握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引经据典地予以论证，从而推翻了包括马礼逊《华英词典》在内的旧译 foreigner（外国人）。这件事对鸦片战争的影响非同小可，当英国国会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主战派就声称“夷”字等同于“野蛮人”，侮辱了英国，从而赢得了舆论，通过了开战决定。

二、罗伯聃

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英国外交官。出生于苏格兰一个煤炭商人家庭，从小受家庭影响立志从商。他14岁便在商店工作，青年时代

往南美经商，展现出商业才华，其语言天赋也初露端倪，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西班牙语。1833年英国国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鼓舞了英国个体商人纷纷前往中国贸易，罗伯聃也因此来华。1834年罗伯聃到达广州，在英商怡和洋行做高级职员。从到达中国伊始，他便意识到学习汉语口语的重要性，从不放过与中国人交谈的机会，两年后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1830年代，在华英国人中只有罗伯聃、马儒翰以及一直为英国效力的郭士立三人能流利地用汉语跟中国人打交道。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方急需汉语人才，罗伯聃遂弃商从政，正式担任了英军翻译。他全程参与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起草谈判，由于表现“出色”，遂在1843年被委任为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在此期间，罗伯聃一直坚持汉语学习和研究，笔耕不辍，出版了四部著作：

1. 《王娇鸾百年长恨》，1839年在广州出版，是本小册子，供在华外国人阅读消遣，“看故事，学中文”。该书将中国古代小说集《今古奇观》中的一个故事翻译成英文，文中附有大量注释和汉字，获得裨治文的好评，1846年又被人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

2. 《意拾寓言》，1840年在澳门出版，是将《伊索寓言》翻译成中文，英汉对照，汉字用南京话和广东话两种话注音。由于其译文精妙而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还被转译成漳州方言本和潮州方言本，更在日本引起“伊索寓言热”。

3. 《华英通用杂语》，1843年在广州出版，是一本英汉对照的词汇短语集，其英文每个单词都相应用音近的汉字注音，但罗氏特意提醒读者要用北京音来读这些汉字才能读出正确的英语，这表明罗氏此时已经学了北京官话。此书是为适应《南京条约》缔结后五口即将通商的紧急需要而编写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教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学习与商贸有关的英语。罗氏希望这部书能及时地发挥作用，于是自掏腰包出版，向当时各国在通商五口的机构、公司和侨民无偿派发。此书后又传到日本，于1860年在日本再版，供日本人学习英语之用。

4. 《华英说部撮要》，1846年在宁波出版，是一部教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是第一部教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而笔者认为《华英说部撮要》才是真正的第一部教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除了教材扉页上题字表明罗伯聃将此书定位于教授北京官话以外，书中内容取材于《正音撮要》、《红楼梦》、《家宝全集》这三部用地道北京话写成的著作也能证明这一点。此外，《华英说部撮要》把《红

楼梦》第六回全部翻译成英文作为课文，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红楼梦》整回英译本。

我们从《意拾寓言》用的注音，可以知道罗伯聃起初学习的是广东话和南京官话。后来他在与中国官僚打交道中意识到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重要性，才刻苦学习北京官话，最后成为威妥玛所说的“惟一一位讲北京官话的有名望的汉学家”⁴⁾。鉴于当时没有教外国人的北京官话教材，罗伯聃抱病编写《华英说部撮要》，终于在1846年完成，同年病歿于任上。

由于他的建议，密迪乐对北京官话也做了研究，并取得伟大成功，后来又是密迪乐将威妥玛引上学习和研究北京官话的正途，这就形成了一条“罗伯聃——密迪乐——威妥玛”的外国人学习研究北京官话之链，这在近代汉语标准语音转型上有着非凡意义。

此外，罗伯聃为广州出版的中英文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还在1838年被增选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英文秘书。难能可贵的是，在大部分外商受郭士立观点的影响，认为“夷”字是用来蔑称西洋人的氛围下，罗伯聃于1837年用“Sloth”的笔名在英文刊物《广州杂录》上发表文章，引用《孟子》的话，认为“夷人”并不具有贬义⁵⁾，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国辩护的作用。

三、马儒翰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出生于澳门，是著名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的次子，因其兄夭亡，一般人以为他是马礼逊的长子。出生次年被患病的母亲带回英国，直至1820年才重返澳门。翌年其母去世，他被送回英国上学，接受基础教育。期间，马礼逊曾于1824年回国休假两年，父子重逢。

马礼逊希望儿子在对华传教及中国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因此1826年休假结束时携其一起返回澳门。在返航途中马儒翰即在父亲督导下学习中文，抵达澳门后继续随父学习。1827年初，被马礼逊送往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经过三年多学习，已能翻译英文传教小册子。1830年，马儒翰到广州担任英国散商的共同中文翻译，时年16岁。1832至1833年间曾为美国出使暹罗使团做临时翻译。期间，马儒翰根据自己的商业工作经验，编纂了《英华行名录》和《中国贸易指南》，于1832年、1834年先后出版。前者利用中国历书形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节气、风俗，同时穿插西方年节、风俗、贸易等知识，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商业文化；后者收录了在华贸易的种种细节，

对在华外商非常有用,当时广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曾给以高度评价:“关于外国对华贸易,我们毫不迟疑地肯定,没有任何一本相同页数的书籍能像这本作品一样,囊括如此之多的实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现今来华从事贸易的商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⁶⁾

马儒翰跟他父亲不一样,马礼逊服务于东印度公司时,在其思想意识里,传教是第一位的,公司的翻译只是兼职。马儒翰不作如是想,他首先将自己作为英国公民要为祖国贡献一切,其兴趣和志向也首先是在政治方面。他虽然积极支持在华传教活动,可是他并不是传教士,不以此为职业。在其父于1834年去世后,他即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正式进入政界,年仅20岁。

1835年至1839年,亦即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是中英贸易纠纷、冲突开始发生的时期。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交涉渐趋繁剧,此时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翻译,他经手的相关公文有几百件,与中国各级官员见面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从中积累了日后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必不可少的经验,其汉语也更臻熟练。这一时期,马儒翰对其父的《华英词典》作了研究,建议抛弃其父的汉字注音系统,并在《中国丛报》上提出了他的注音方案大纲。

鸦片战争爆发后,马儒翰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军和英国全权代表的首席翻译,全程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起草谈判工作,竭尽所能出谋划策,为英国谋取最大利益。《中国丛报》云:“这场冲突从开始到结束,马儒翰都一直担任着为英国服务的重要职责,兢兢业业,尽忠职守。”⁷⁾鸦片战争后,马儒翰被任命为香港殖民政府中文秘书兼翻译。

除了上述商业和外交活动外,马儒翰还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是参与修订马礼逊的《圣经》中文译本。1835年,由马儒翰主持,与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圣经》中文译本进行重新修订。此项工作在1836年至1840年之间完成。

二是印刷出版活动。马礼逊是将西方现代石印技术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而由马儒翰向中国印工传授石印技术。“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⁸⁾这里有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马儒翰还于1833年开始铸造中文铅字,尽管不到一年被迫停顿,但他毕竟是在中国铸造铅字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有他的地位。

三是著述活动。马儒翰除了著有前述两本商贸专书外,还翻译、撰写了大量单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广州、澳门出版的中外文报刊上。据统计,仅在

《中国丛报》上，从1832年至1843年，马儒翰就发表了84篇译作和文章，内容覆盖中国地理、政治、语言、中英关系、商业贸易等，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1833年他在澳门出版过《中国布道与中国消息》旬刊，因澳门天主教会的反对，只出了4期就停刊了。1841年5月，他又在香港创办英文报纸《香港公报》，后成为港英政府官方周刊。

四是发起创办协会。鸦片战争前，广州的外国侨民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中华医务传道会，马儒翰都是发起组织者和负责人之一。这三个协会在传教的相同目标下，分别在出版介绍西方科技书籍和知识，创办西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引进西医、开办西式医院这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有所贡献，马儒翰在这三个协会上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1843年8月29日，正当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马儒翰在澳门因患急性疟疾而突然去世，年仅29岁。

四、结语

笔者对以上所述作简单小结。从学习汉语的动机和过程来说，三人各不相同。郭士立的动机始终是为了传教，其学习汉语完全依靠自学；罗伯聃学习汉语始则为经商，后为从政，亦是自学成才；马儒翰是三人中唯一科班出身，受过英华书院正规汉语教育，但却是遵从父命走上学习汉语之路。从三人行迹来看，笔者推测他们都是先学方言，然后再学南京官话。因为其时北京官话尚未在全国通行，华南一带通行的是方言和南京官话，这从马礼逊《华英词典》及罗伯聃《意拾喻言》的汉字注音便可知道。据顾长声言，郭士立第一次沿海航行时还不会说北方话，也可作为佐证。⁹⁾三人中只有罗伯聃后来学会了北京官话，郭、马二人始终不会说北京官话，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序言中有言道：“惟一一位讲北京官话的有名望的汉学家是罗伯特·托姆先生（即罗伯聃）”，可为证明。三人在《南京条约》的谈判翻译中，郭士立和罗伯聃负责口译，马儒翰负责条约文本的起草与核对¹⁰⁾，这种分工大概也可说明三人各自的汉语水平和特点吧。

三人在中文著述方面各有成就。郭士立的兴趣比较广博，侧重于传教、历史、文学；罗伯聃侧重于编写汉语教科书，商贸汉语是其特色；马儒翰侧重于对中国现状、动态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外学者对郭士立的著述活动有不同评价，比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批评郭士立的专著《开放的中国》创作草率，修订粗糙，其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不实报道，还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

抄袭”，韩南教授则说：“郭士立的书当然是粗制滥造的，他几乎没法不粗制滥造。从1834年至1839年间，在艰难的条件下，他用中文出版了至少三十四部著作，其中许多是大部头的”，言下之意短时间内产量颇丰但质量低劣¹¹⁾；而中国学者吴义雄评论郭氏《开放的中国》时认为郭氏“比写作《中国简史》准备得更为充分”，“不致流于空泛，或重复他人的成果”，“这样全面而清楚地展示清代中国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在当时的西方是比较少见的”¹²⁾。

综观三人的汉语活动，笔者认为罗伯聃、马儒翰二人重在实务，而郭士立不仅干实务，还提出了许多战略和策略。罗伯聃最大的成就是将《伊索寓言》这部世界名著引进中国，编著了首部外国人的北京官话教材《华英说部撮要》；马儒翰的最大贡献是建议彻底修改马礼逊《华英词典》的汉字注音系统，较早提出了一个汉字注音方案大纲，是现代汉字注音研究的先驱之一；郭士立的最大影响是向西方人展示了19世纪的中国社会面貌，在颠覆16世纪以来由耶稣会士带给西方的“中国观”，重塑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方面是个重量级人物。

三人在汉语方面卓有成就，然而都参加了鸦片战争，因而评价不一。笔者摘其要者叙述如下：

对郭士立的评价，以前皆谓其为“强盗、间谍、鸦片贩子”，然而近来有论文考订史料谓郭氏任宁波民政官时曾严肃军纪，在宁波地方志有正面的记载。对罗伯聃、马儒翰的评价也大致如此，近来也有些对其有利的史料渐次浮出水面。笔者在这种变化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对他们三人的评价依据大多出自清廷档案，而近来出现的变化依据则来自地方志或者野史，亦即民间。当时的中外官方对他们的评价更是大相径庭，比如对于罗伯聃、马儒翰之死，《中国丛报》讣告中说港督璞鼎查视马儒翰的英年早逝为“无可挽回的国家灾难”；而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在得知马儒翰早逝的消息后，向皇帝奏道：“夷目马礼逊，生长广东，居心狡诈，善能窥伺内地一切情形，又能通汉语，习汉字，连年以来，阴谋诡计，主持其事者，虽不止伊一人，而多半听其指使，实为罪魁。今因积恶贯盈，竟伏冥诛，凡有知认者，无不同声称快”，浙江巡抚梁宝常也在奏折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真是相映成趣！从清廷大员幸灾乐祸托庇天地的话语中我们可引发出什么样的思考呢？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罗伯聃、马儒翰、郭士立、威妥玛等的在华汉语活动研究”(项目批准号: 11YJAZH095)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 1) Suzanne Wilson Barnett, John King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3.
- 2) C.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p. 71.
- 3) “Journal of Ira Tracy”, *Missionary Hevald*, Vol. 31, p. 69.
- 4) 威妥玛:《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序言》, 转引自威妥玛著, 张卫东译《语言自述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p. 14.
- 5) [新加坡] 庄钦永:《镀金鸟笼里的呐喊: 郭实猎政治小说〈是非略论〉析论》, 注〔88〕, 《国际汉学》2013年第1期, p. 84.
- 6) *Chinese Repository*, 1834, vol. 3, pp. 386-387.
- 7) *Chinese Repository*, 1834, vol. 12, p. 460.
- 8) 转引自谭树林《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 《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p. 70.
- 9)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p. 52.
- 10) 胡其柱, 贾永梅:《翻译的政治: 马儒翰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浙江社会科学》, 2010年第4期, p. 89.
- 11) 转引自王燕:《宝玉何以被误读为女士? ——评西方人对〈红楼梦〉的首次解读》, 《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 p. 129.
- 12)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 p. 507.

アヘン戦争時期の中国語「三銃士」

——ギュツラフ、ロバート・トム、モリソンの中国語活動

王 幼 敏

19世紀はイギリスがフランスに代わり覇権を握った世紀であり、そのイギリスは西洋を従えた後、夢にまでみた東方の清帝国に対し急激にその矛先を向けた。当時イギリスは産業革命を成功させたものの、植民地として拡大した北米・アフリカ・インド及び東南アジアだけでは市場不足の状態であったため、中国の膨大な人口が作る巨大マーケット及び果てしない領土と豊かな資源は喉から手が出るほど欲しいものであった。当時は西洋の新教勢力が急速に膨張した時期であり、イギリスは新教勢力の中心となる国であった。そこで多くのイギリス商人達は中国で一攫千金を夢見る「中国ドリーム」をめざした。宣教師と商人達は中国に向かうパイオニアであり、強大なイギリスの国力を後ろ盾とし「中国ドリーム」を実現させるために次々と中国に渡り、積極的に中国語を学び一種のブームを引き起こした。イギリスと中国の関係の「熱烈」度はアヘン戦争時にピークを迎えたが、この時期の歴史の中から、名声高き中国語学習成果を挙げた三人の西洋人を発見した。三人の中国語レベルは現代に置き換えれば中国中央テレビ局「漢語橋」コンテスト出場者並みであるが、実際の中国語運用能力は大きく「漢語橋」コンテストチャンピオンのレベルを超えていることは紛れもない事実である。この三人の「中国語学習」の意義は現代にも十分に活用されるものであり、彼らこそが本論文で論述するカール・ギュツラフ、ロバート・トム、ジョン・ロバート・モリソンである。

カール・ギュツラフ、ロバート・トム、ジョン・ロバート・モリソン、この三人は19世紀30年代から40年代に中国で活躍した人物の中でとび抜けた人材である。故に筆者はフランスのデュマの小説である「三銃士」の名前を借用して「中国語人材の三銃士」と名付けた。ロバート・トム、ジョン・ロバート・モリソンはイギリス人、カール・ギュツラフはプロシア人ではあるがイギリスの利益のために働き、後先3人のイギリス人女性と結婚したため、半分イギリス人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三人は出身や職業はそれぞれ異なるが、アヘン戦争という歴史の大舞台で共通の武器——秀でた中国語、を用いてイギリス帝国の偉業のために中華帝国と戦い、死ぬまで続く人生のお芝

居を演じ、最後には皆中国にその身を葬り、同様の結末を迎えたのである。

彼らは同時期に生き、同様にイギリスに仕えたこともあり彼ら相互の関係は密なものであった。三人はその年代に中国語を学び、その中国語を駆使した「成功人物」であり、19世紀中期に中国語を習得した外国人の傑出した代表の典型としての意義をもつ。

本文の重点は彼らがアヘン戦争時に通訳として立てた「功績」ではなく、彼らの中国での中国語活動を総合的に論述した内容に置き、彼らの中国語学習過程及び中国語を駆使しての布教・商売・外交・著作活動・翻訳活動・新聞発行・学校設立等を本文では一言にまとめて「中国語活動」の範囲とし、下記の観点から論述した。

- 一、三人の中国語学習の動機及び過程
- 二、三人の中国語の特色とレベル
- 三、三人の中国語著作・翻訳作品と教科書
- 四、「モリソン教育会」・「在中国実用知識伝達会」・「東西洋考毎月統紀伝」
- 五、三人への評価